



## 《鲁迅的饭局》

作者:薛林荣 出版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:2021年3月

# 薛林荣的“微观鲁迅”研究

姜宏

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“鲁迷”，这么多年来，除了陆续收藏有不同版本、不同体例的鲁迅全集、选集、单行本外，也将不少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专著，甚至一些普及性的读本纳入囊中。粗略统计，目前也有百余种了。在浩瀚的“鲁海”中尽情畅游，所能感受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快乐。

当下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，即鲁迅著作难读，连带着有关鲁迅研究的论著大多也是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，但也有例外，例如近些年出现的“微观鲁迅”现象，就是将鲁迅研究中晦涩难懂的内容拆散揉碎了呈现给读者，以达到传播、普及之目的。而这其中，青年学者薛林荣出版的“鲁迅的……”系列最引人注目。据我所知，这一系列包括《鲁迅草木谱》《鲁迅的饭局》《鲁迅的封面》《鲁迅的门牌号》四本，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我最早购得的是《鲁迅的饭局》。记得2021年7月的一天，我驻足厦门“中华城”附近的一家书店，冷不丁地瞄到这本书。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，仅看书名，感到有些俗，但当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取来翻阅后，却甘愿花钱为之捧场了。原来，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，通过大量相关资料，还原鲁迅的一场场饭局，让我这个“鲁迷”茅塞顿开。

譬如书中所讲到的一场饭局——“南云楼风波”，说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一次正面思想冲突。对于这场由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做东的饭局，鲁迅的说法是：“席将终，林语堂语含讽刺。直斥之，彼亦争持，鄙相悉现。”而林语堂的回忆是：“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，对了足足两分钟。”按照薛林荣的分析，“以‘南云楼事件’为转折，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‘相得’，开始了第一次‘疏离’。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。林语堂在日记中很少提及‘鲁迅’二字，与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则交往密切。”

意想不到的，这次“南云楼风波”，还造成了鲁迅与另一位“相得”者——杨骚的“疏离”。杨西北所著《心曲·乡曲——儿子笔下的诗人杨骚》也对“南云楼风波”作了记述，毕竟其父杨骚也是当时饭局的参加人之一。林语堂和杨骚同为漳州乡亲，或许因为这原因，鲁迅与杨骚的关系也由亲转疏。

后来，我又陆续买来《鲁迅的封面》《鲁迅的门牌号》和《鲁迅草木谱》，进一步领略了薛林荣视野下“微观鲁迅”的研究成果。应该说，无论是“饭局”“封面”，还是“门牌号”“草木”，都是极其细微的视角，但细细品味，则大大加深了我对系列丛书的好感以及对作者的敬佩之情。

说是喜好，主要是作者能在鲁迅研究的小切口探究上做文章，别开生面，

令人耳目一新。譬如《鲁迅的门牌号》将视角聚焦于鲁迅生活过的绍兴、南京、仙台、东京、杭州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、上海等城市的具体住所、方位乃至门牌号，通过对鲁迅日记和书信的潜心研究和深入发掘，以小见大，读起来饶有兴趣。又如，《鲁迅的封面》以现代书刊装帧设计为切入点，通过对《彷徨》《坟》《野草》《朝花夕拾》《两地书》等鲁迅作品封面设计的深度探究，不仅让读者能一睹鲁迅作品之初版本封面设计的风采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史料价值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说是敬佩，主要是基于作者严谨而严肃的研究方法。作者对资料进行了认真梳理归类，还实地探访，通过手绘方位图等等，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鲜资讯。例如《鲁迅草木谱》中，当讲到脍炙人口的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时，作者在文末不忘提醒读者：“遗憾的是，现在去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胡同鲁迅博物馆后院的鲁迅故居参观，见不到这两棵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甚高的枣树，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。”

我无法揣测薛林荣的微观鲁迅研究之路还会走多久，接下来还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，但就内心而言，我倒是希望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持续下去，并被更多人发扬光大，真正让鲁迅及其作品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开卷有得

微书评



●[俄]帕维尔·巴辛斯基著，何守源译：《列夫·托尔斯泰：逃离乐园》。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7月  
开场是1910年10月28日深夜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，然后探究原因。无疑是托尔斯泰传记中最新也最好的一种，作者用了大量中文世界难得一见的史料，比如托尔斯泰子女和身边人士的回忆录、日记、书信等。

(四旗儿)



●毕飞宇：《欢迎来到人间》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3年7月  
十五年磨一剑，毕飞宇继《推拿》之后带来最新力作。从一个外科医生入笔，多角度描摹医患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原生家庭和科室关系等，带我们全方位洞察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顶尖医生傅睿内心的痛楚。

(透明心)



●[美]W.S.默温著，柳向阳译：《清晨之前的月亮》。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3年7月

默温晚年最后两本诗集《花园时光》《清晨之前的月亮》的合集。诗句看似平淡，却回环缠绕。对世界的体验看似宁静，却充满惊讶、好奇、意外——的确有着寒山和李白的回响。

(胡桑)

畅销书摘

## 《疫病年代：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、战争与社会》

作者:袁灿兴 出版:岳麓书社 时间:2023年8月

疫病如何塑造历史?东汉至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瘟疫频发期，作者重新审视这一“幽暗时代”，细致书写瘟疫对政治、战争、社会、文学、医学、魏晋玄学、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造成的深刻影响。

# 疫病年代的社会心理



在人类文明发展前行之中，难免会遇到各类破坏性的力量，诸如战争、天灾、疫病等。与战争和天灾相比，由各类病菌引起的疫病，更加让人类手足无措。诸如伤寒、肠癖、疟疾、霍乱、麻风等疫病，都具有极强的致死率与广泛的传播性。每当此类疫病暴发，人类为之悚然，生命随时会断送，人们便会陷入恐惧无望之中。

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，此期间政局混乱，战争频繁，各类瘟疫频频降临。后世科学家认为，此一阶段乃是小冰河期，酷寒的天气既带来了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，乍暖骤寒的变化又给予人类身体以刺激，导致了各类疫病的暴发。东汉末期，疫病肆虐，当时的人行走于道路之上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人人惊悚。疫病数起，士人凋落，建安七子中，有五子死于建安二十二年(217)的大疫。上层社会尚且如此，缺衣少食的民间社会其惨状可想而知。

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，亦影响着国运。东汉至魏晋时期，大疫酷烈，虽贵为帝室也不能避免。疫病之下，皇帝普遍早逝，而帝室虚弱，权力遂流失于外戚与宦官手中。由外戚、宦官专权，终又引发与文官集团的内斗，以致朝局动荡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，加深了危机，这又更加导致了疫病的蔓延，形成了恶性死循环。内斗、战争、饥荒、疫病、

死亡，不断反复，不断上演。此死循环，由东汉末至魏晋再至南北朝，犹未能解，影响长达数百年。

困境之中，巫觋治病盛行，江湖术士行走于世，以符水之类治病，被民间崇拜，他们吸纳万民，此时若某人有问题，则呼吸之间，可撼动河山。当然也有如张仲景、华佗这样的医者，他们承袭先秦至两汉的医学成就，对各类时疫进行探讨，提出相对合理的医疗方法。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使传统医学摆脱了玄奥抽象的空谈，产生出了系列具有实效的医疗方法，奠定了日后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。为了应对疫病，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，观察到一些具有辛香味的植物能够驱除蚊虫，并具有药效，由此开启了人类对香料的使用。诸如花椒、茱萸、生姜等，因其具有的药效，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，以消除疫病。各类辟疫民俗也由此发展起来，如佩茱萸，饮菊花酒，风行南北，传承直至今日。

中国古时认为，战争取胜的三个条件乃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时地利，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。寒冷或是酷热的天气，蚊虫出没的丛林，不同地区间的水土不服，都会诱发各类疫病。在东汉末期的群雄征伐中，曹操折戟于赤壁，其中主要因素，乃是北方士兵至南方后，受寒冷天气与水土影响，军中暴发大疫，不得不退兵，由此三国鼎立局面出

现。三国之中，孙权一直觊觎合肥，拿下此地，即可获得进军江淮的稳固基地，又可以移民拓荒，增强国力。只是合肥复杂的水文地理导致各类疫病多发，屡屡挫败孙权的野心。诸葛亮想拥有雄固的后方，为此向南方开拓。只是南方疟疾多发，诸葛亮的南征，不得不速战速决后撤兵，以致未能对南方加以整合。在三国争雄之中，缺乏大后方有力支撑的蜀国最终落败。

面对疫病，儒生们开始沉思，他们希望能掌握灾异的解释权与话语权，进而能制约帝王，实现儒生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美梦，随之天人感应、阴阳灾异、五德终始、讖纬之类学说大兴。此类造说之中，如天人感应说认为，人君逆天而为，上下不和，阴阳失调，则妖孽生，灾疫行，故而帝王需要罪己，改正错误。随着疫情频发，帝王自然不愿意每次都背锅，于是拉着大臣一起承担责任，故每至灾疫起，则要罢免三公，这又为宦官、外戚干政提供了契机。

朝堂中的内斗，生命的无常，疾疫的横行，让朝不保夕的魏晋士人，将精神投入到玄学之中，去思考本末有无，去亲近山水，去感悟生命，乃至形成了各类放浪形骸的行径，如服散、裸奔、酗酒、持麈尾、隐遁等。然而，玄学也好，风流也罢，终究是贵族们的游戏，深处疫病时代中的普通人则只能在宗教中寻求寄托。



●[英]理查德·欧文登著，刘佳明译：《焚书：知识的受难史》。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23年7月  
知识特别是书籍的被毁史，值得一读。除了焚书的传统威胁，也紧贴

时代，纳入了信息时代娱乐至上信息过剩的威胁。文笔则一般，很多转接比较生硬。整体读起来像推开门看到一墙堆满好书的书架。

(Philex)



●许致远著：《梁启超：亡命(1898-1903)》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《梁启超》五部之第二部，梁启超的25~30岁，变法失败，流亡海外岁月开始。横滨、悉尼、温哥华、纽约、旧金山……串联起当时世界各地的华人生态。他在万象奔腾的世界变革里行走思考，寻找未来中国之命运方向。

(艾秋水 整理)